

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与妇女运动

编者按：下面推送的文章是秘鲁共产党在 1973 年发表的文件。这一文件是无产阶级女权主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一部分）的一部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马利亚特吉与妇女运动（1973）**

一、马克思主义与妇女问题

在民众斗争中，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现在这一点变得更为关键，因为需要动员妇女的运动正在日渐增加；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在为人们服务的过程中进行，但又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并被剥削阶级所推动的必需而又卓有成效的动员，往往会作为分裂和束缚人民斗争的因素。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妇女群众政治化的新时期，在妇女更广泛参与国家经济领域的基础上，必须对理论研究、政治团结与组织工作的一致性等方面的妇女问题加以重视。这项任务要求（我们）牢记马利亚特吉的论文，该论文教导说：“**女人，或是男人，都分为反动派，革命派和中间派，因此他们不能同时站在一起进行同一场战斗。总体来说，今天阶级比性别更多的将个体区分开来**”。这样的话，从一开始，为了科学地理解女性问题，无疑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出发。

1. “女性具有本质缺陷”的妇女理论

几个世纪以来，剥削阶级一直坚持并推行“女性具有本质缺陷”的伪理论，这种理论是在为迄今为止剥削阶级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压迫寻求合理性。这里犹太男人的祈祷：“赞美上帝，我们的主和万物之主，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女人。”以及犹太妇女所说的，充斥顺从的祷词“赞美上帝，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明确表达了古代世界对女性处境的蔑视。这些想法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中同样占有主导地位；著名的毕达哥拉斯说：“有一种好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与男人，还有一种坏的法则创造了混沌，黑暗与女人。”甚至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宣称：“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女性的特征受到一种本质缺陷的影响”。

这些提法流传到罗马奴隶社会末期。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通过将女性称作“罪恶的源头”和“前往地狱的候车室”，强化了对女性的蔑视。特土良声称“女人你是魔鬼的门。你说服了魔鬼不敢正面攻击的人。因为你的过错，上帝之子必须死去；你应当始终身着丧服和褴褛”；希波纳的奥古斯丁也说“女人是一头既不坚定也不沉稳的畜生。”虽然这些人受到了谴责，但其他人仍然宣称女性应当自卑和顺从；譬如塔尔苏斯的使徒保罗布道说：“男人不是取自女人的，而是女人取自男人”；还有“就像教会服从基督一样，让女人一切都服从她的丈夫。”几百年后，在 13 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用相似的话布道说：“男人是女人的领袖，正如基督是男人的领袖”，“事实上，女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男人的权威之下，她自己没有权威。”

对于女性状况的理解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步多少，尽管自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孔多塞已指出其社会根源：“据说女性……缺乏正义感，并且她们服从了自己的感受而不

是他们的良知……这种差异是由教育和社会存在导致的，而不是固有的性质。”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也写道：“我为你们女性感到难过”，并说“在所有习俗中，民法的残酷性是自然残酷性的帮凶，她们（女性）被视为是愚蠢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先进思想家卢梭却坚持说：“女性的所有教育都必须与男性相对……女性应该屈服于男人并忍受他的不公正。”这种资产阶级立场延续到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反动，并掺入基督教的立场，重申了《约翰福音》第 23 章的旧论点：“上帝和大自然赋予了女人各种各样的琐事，这些琐事完善和补足了赋予给男人的那些琐事。”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到剥削阶级一直在宣扬“女性的本质缺陷”。他们坚持理想主义的观点，重申了独立于社会条件的“女性本质”的存在，这是反科学“人性”论题的一部分；这种所谓的“女性本质”，所谓的永恒和不变的本质，又被称为“缺陷”来证明女性的状况和他们对女性进行的压迫和庇护是她们“本质上比男性低等”的结果。借助这种伪理论，资产阶级试图维持和正当化妇女对他们的服从。

最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指出，即使是像德谟克利特这样出色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会对女性产生偏见（“一个熟悉逻辑的女人是可怕的”；“女人比男人更加倾向于产生邪念”）。而对女性的辩护是基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论证（夏娃象征着生命，男性象征着土地；因为创造于男人之后，女人完成得比男人更好）。即使是资产阶级，当它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时，也只是将女性视为男性，而不是独立的存在。

2. 资本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妇女参与劳动过程，为妇女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提供基础和条件；这样，通过将她们纳入生产过程，女性将有机会更直接地参与阶级斗争和战斗行动。资本主义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的熔炉中，妇女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进步了。

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最先进的革命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妇女和其他群体一起动员起来，参加民间俱乐部并开展革命行动。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妇女协会”。借助奥兰普·德古热（女权活动家），在 1789 年她们要求制订一份女权宣言，并创建了像《急躁者》这样的报纸，要求改善她们的状况。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妇女战胜了男权的压迫并废除了男性特权，她们也获得了平等的继承权和离婚权。她们富有战斗精神的斗争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是，这场伟大革命一停止下来，女性就被剥夺了进入政治俱乐部的权力，女性群体的政治化进程被压制，她们看见自己受到指责并被催促返回家中，她们还被告知：“从何时起，女性被允许放弃性别成为男人了呢？大自然告诉女人：成为一个女人。你的例行工作在于育婴，家务事和身为母亲（所要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挑战。“更重要的是，在拿破仑发起的资产阶级改革中，根据《民法典》，已婚妇女又回到了受庇护的地位，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归她丈夫所有；她对父权的质疑被否认了。像妓女一样，已婚妇女丧失了公民权利，同时她们也被剥夺了离婚和转移财产的权利。

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妇女的进步及其挫折是如何与人民和革命的进步和挫折联系在一起的。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的利益和人民斗争的利益，前者是如何成为后者的一部分的。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也表明了关于妇女的观念如何遵循类似于政治进程的过程；一旦革命高潮遭到反扑并停止，针对女性的反动思想就会重新出现。博纳尔（Bonald）坚持认为：“男人之于女人，就像女人之于孩童”；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提出，女性特征是婴儿期的一种延续，这种生物学的婴儿期表现为智力上的弱势；巴尔扎克写道：“女性的命运和她们唯一的荣耀就是让男人心动。女人是通过合同获得的财产，一个移动的个人财产，因为财产是值得一提的；总之，恰当的说，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所有这些反动的意识形态都由拿破仑用以下词语汇总了：“自然希望女性成为我们的奴隶……她们是我们的财产……；女人只是生产孩子的机器而已”；为女性塑造了这样的身份，即女性生活应以“厨房，教会，儿童”为主旋律，这是希特勒在本世纪也认可的一句口号。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三项原则，并承诺伸张正义，满足人民的要求。但很快它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的原则性宣言只不过是一纸正式的声明，那时它（所代表的）的阶级利益符合群众的利益；除非建立新的秩序，否则苦难、饥饿、痛苦和不公将继续存在。为反对这种秩序，乌托邦主义者发起了尖锐而又有力的批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他们的批评无法触及这些罪恶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资本主义下的妇女状况。这一立场的代表者傅立叶指出：“历史时代的进步程度总是取决于女性的进步程度……女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面对这一伟大的主张，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关于女性的思想，并在今天有人试图将无政府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时申明他的想法，把蒲鲁东这些想法作为无政府主义所谓“革命的”视野以及坚持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后果。蒲鲁东认为，女人在身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如男人，而且用数字来代表女人（的价值），女人的价值是男人的 $8/27$ 。所以对于这位“英雄”来说，一个女人所代表的价值不到男人的三分之一；这不过是其提出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则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共同的根源。

在整个 19 世纪，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妇女继续为加入工人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政治诉求而斗争。这种斗争的一个范例是路易莎·米歇尔，她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一位战士。但是，女权主义运动总体上是朝着扩大选举权的方向进行，即为争取妇女投票的权利而奋斗。她们追随着“取得了投票权和议会席位，她们的权利就将受到尊重”的错误观念；这样，女权主义行动被引向了议会道路——一个削弱她们革命性和革命力量的方向。然而，值得铭记的是，投票不是凭空实现的，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妇女们为争取它公开并坚决地付出了努力。争取女性投票的斗争及其成果再次表明，虽然这确实是伟大之举，但它并不是真正改变妇女状况的方法。

20 世纪意味着女权主义经济斗争的更大发展，女性工人和女性雇员的大量增加壮大了专业人员的队伍；女性进入所有生产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将数百万妇女纳入经济生产体系中以取代被动员到前线的男人们。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进了妇女的动员、组织化和政治化进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妇女们以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再度发动女权主义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一步增强，前景一片光明。

总之，通过使妇女参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为她们的经济自治奠定了基础；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赋予妇女真正的法律平等；资本主义绝不可能解放她们；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其最进步的革命也就是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他们除了发布一纸正式的《人权宣言》以外根本就没有推动女性权利方面的丝毫进步。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后期发展和 20 世纪本身不仅表明资产阶级无法解放妇女群众，还表明了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关于女性状况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更加反动，同时这些历史也证实了妇女

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上遭受的压迫，即使资产阶级以各种方式粉饰和伪装这个事实。

3.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将人类视为随着社会过程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人性”这一论断作为永恒不变的存在，并反对将其置于社会框架之外；我们反对的这种论断是唯心主义和反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意味着克服机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旧唯物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机械唯物主义意味着无法理解人类作为现实的反映者的历史和社会性质，因此采取这一观点的人不得不非理性地依赖于形而上学或精神状态（来理解社会现实），例如费尔巴哈。

正如认为人是历史上由社会造就的一种具体存在一样，马克思主义绝不接受“女性本质”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不过是所谓“人性论”的补充并重申女性具有“永恒不变的本性”这一观点而已；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唯心主义和反动观点所理解的“女性本性”是女性相对于男性拥有“缺陷和劣质的本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女性和男性一样，只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改变而适应和改变。因此女性是社会的产物，她的转变也需要社会的转变。

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关注妇女问题时，它是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出发，从一个能够让我们真正完全理解问题的科学观点出发的。在对妇女及其状况的学习、研究和理解上，马克思主义从财产、家庭和国家三个方面来看待妇女问题，因为历史上妇女的状况和历史地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女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一个非凡例子可以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看到，他把父权取代母权作为妇女屈从的开始，写道：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我们强调）

恩格斯的这一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论点：妇女的状况在财产关系中得到维持，以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的形式呈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极其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与女性状况有关的压迫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成，出现和发展，因此女性解放与破坏（男性）声称的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权利就息息相关。为了对妇女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从这个伟大的论述出发，并且在所谓的革命者甚至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女性压迫不是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出现，而是源于利用性别进行的简单劳动划分——这种划分将相对不重要的例行劳动赋予给女性，而不是男性，将她限制在家的范围内——的时候，这一论点就更显得不可或缺。尽管那些鼓吹和尝试都将其（指性别分工论）视为革命

性的，但这一提法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立场的替代，这种资产阶级的提法本质上只是所谓不变的“女性本质”的变种。

在这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恩格斯讲述了专偶制家庭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他说：“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并且说：“可见，个体婚姻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强调）

在确定私有制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并准许了对妇女的压迫之后，恩格斯确立了三种基本婚姻形式与人类进化历史中的三个大阶段的对应关系：野蛮阶段与群婚制；未开化阶段与对偶制；文明阶段与“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关于女性社会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的论述；并且指出女性的状况是如何与私有制，家庭和国家（它是使男女间不平等关系合法化并通过武力施加和维持它们的机构）密切相关的。

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上妇女状况的分析的产物，最基本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些论述的现实性和准确性，这是工人阶级理解女性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让我们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来进一步说明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提出的内容。

在原始公社，男女在自发平等和妇女参与社会群体决策中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后来，妇女被尊重、体谅、恭敬甚至被特权所包围。但当财富开始增长，提高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推动父权取代母权的进程时，女性开始转向社会发展的幕后，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恶化；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时代，他在他的作品《复仇三女神》中写道：“不是母亲造就了被称为她的儿子的人；她只是存放在她子宫中的胚胎的看护士。造就它的是父亲。女性作为外来物的存放之处接收种子，如果这样能取悦众神，她才能留下它。”

因此，在希腊奴隶社会中，女性的状况是屈从、卑下和社会蔑视的对象。其中有人说：“奴隶毋庸置疑缺乏深思熟虑的自由；女人有这种自由，但却以微弱而低效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最好的女人是男人（向她）说话最少的女人”（伯里克利）；调查公共事务的丈夫的回答“这不是你的事。闭嘴，以免我打你……继续编织”（阿里斯多芬尼斯，《利西翠妲》）这些话牵涉到什么现实呢？希腊妇女长久以来被置于弱势地位；在她们监护人（无论是父亲，丈夫，丈夫的继承人还是国家本身）的权威下，她们的生活都在不断的监护下进行。他们得到了结婚嫁妆，所以她们能获得生活所需且不必忍饥挨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被授权离婚；其余的，在专门机构的控制下，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被弱化为厌女症者。当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时，妇女可以继承，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与父系氏族中最年长的亲属结婚；这样她就不是直接继承人，而只是继承的转移者；一切都为了保存家庭财产。

在同样是奴隶制社会的罗马，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作为家庭、国家和私有制衍生的罗马妇女的社会状况。在塔魁尼阿斯统治之后罗马建立了父权制，私有制和家庭成为了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妇女将继续受到遗产和家庭的影响。她被排除在每一项“男性工作”之外，在公共事务中，她的地位相当于未成年人；她的继承权并没有被直接剥夺，而是处于监护之下。在这一点上，罗马法学家盖乌斯说：“监护是为了监护人本身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本应是他们的继承人的女性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的遗产继承权，并且不能通过转让或债务削弱这一点。”因此，对妇女施加的监护权的根源显然已经暴露和确立效用。

在十二铜表法之后，妇女对父系氏族具有从属关系的事实和夫妻关系（严格来说也是为了保护财产）产生了冲突，这是推动罗马“法律解放”的基础。“无夫权”婚姻出现了：她的动产仍然依存于她的监护人，而她的丈夫只获得了对她本人的权利，并与“家父”分享权利，后者对女儿保留绝对的权威。并且出现了家族内部的特别法庭，以解决女方父亲和丈夫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这样，女人可以向她的父亲就与丈夫的分歧求助，反之亦然：“这不再是妇女个人的问题了。”

在这种女性在监护下参与继承的经济基础以及父系和配偶在妇女和她的动产上的权利冲突之下，尽管受到法律的限制，罗马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机构“中庭”建立起来了，“中庭”是家族的中心，负责管理奴隶的工作，对子女进行教育并影响他们直到子女较为年长为止。她分享配偶的工作和疑难问题，并被视为配偶动产的共同所有人。她参加集会，在街上即使是领事和治安官也会给她优先通行权。罗马妇女在社会中的分量反映在格拉奇的母亲科妮莉亚身上。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国家间的争端取代宗族间的争端，承担了处理有关妇女、离婚、通奸等方面争端的责任，这些争端在公共法庭上被审理，这使得家庭法庭得到废除。而在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帝国出于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废除了对女性的监护。妇女得到固定的嫁妆（个人财产），这些财产不属于父系亲属，也不属于丈夫及其亲属；就这样，妇女取得了自身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共和国结束时，母亲们就已经获得了受到公认的对其子女的权利——在父亲做出不当行为或被收监时取得对子女的监护权。

在皇帝马库斯·奥里利乌斯的统治下的178年，妇女解放进程在财产和家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儿童被宣布为继承顺序上优先于其父系亲属的母亲遗产继承人；这样一来，家庭就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母亲在孩子面前与父亲平等，孩子们也被认为是妻子的孩子，并且源于上述（规定），女儿可以与她的男性兄弟一样具有继承权。

但是，虽然国家从家庭中“解放”了来自家庭的妇女，但它使她们服从于国家的监护并限制其行动。与女性在社会中崛起的同时，在罗马人们发起了一场反女权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试图唤起女性的自卑感并搬出“性别使然的愚蠢和脆弱”的观点来合法地削弱她们（的地位）。

这样，在罗马，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女性比在希腊过的更好，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尊重，甚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卡托的话所示：“男人在世界各地都统治着女人，而管理所有男人的我们都是由我们的女人统治的。”罗马历史上有着杰出的高尚女性，从萨宾斯、卢克丽霞和弗吉尼亚再到柯尼莉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和第二世纪末期，人们从因为她们的妇女身份而对女性提出批评发展为仅仅从同代人的角度进行批评；因此，尤文嘲讽她们：（女性）淫荡，贪食，（她们）投身于男子的职业以及（像男性一样）对狩猎和运动保有热情。

罗马社会承认妇女的某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但没有向她们开放民事活动，更不用说参与公共事务了，妇女参与这种活动被视为非法并被加以限制；因此，“失去了古老美德”的罗马主妇们倾向于寻求其他领域来运用她们的力量。

在奴隶制衰落和封建制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女性状况，就必须考虑基督教和日耳曼人的影响。基督教在女性压迫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教会神父中流行一种贬低妇女的行为，他们认为女性是劣等的，是男性的仆人和邪恶的根源。对于这一点，让我们援引天主教圣徒圣约翰·克里斯托莫斯的谴责之语：“没有什么野蛮的畜生和女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在这种影响下，罗马立法所取得的进步首先被弱化，后来则被直接取消。

而在以战争为基础的日耳曼人社会中，妇女由于体力较弱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她们受到尊重，并拥有使她们成为配偶于当时而言较为平等的伴侣的权利。让我们记住在这个话题上塔西佗所写的：“（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她分享他的好运；她与他同生共死。”

基督教和日耳曼主义影响了封建主义下的女性状况。妇女处于对父亲和丈夫绝对依赖的境地；在克洛维斯国王的时代，“这种庇护一生都在沉重地压迫着她。”尽管妇女“作为男人的财产和孩子们的母亲”受到法律的保护，妇女的生活仍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她作为男人财产的价值随着生育能力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价值比一个自由人贵重多了，而当她再也无法生育后代时，她失去了作为财产的价值：女人在那时不过是被视为生殖后代的子宫。

正如在罗马发生的那样，我们看到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状况的演变，在遏制封建势力和增强王权的过程中：庇护权从领主转移到国王身上；这种庇护成为监护者的负担，但监护下女性的屈从仍然被保留下来。

在封建主义形成的“阵痛”时期，妇女的状况并不确定；由于君权和财权、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没有被明确确定下来，妇女的状况根据社会偶发事件变得忽高忽低。

首先，因为妇女没有公共权力，她们被剥夺了私人权利。在11世纪，军队和武器被用来直接强加秩序并维护私人财产：对于法学家来说，封地“是一块拥有能够服兵役的人的土地”，因为妇女无法拿起武器保卫封地和服兵役，所以妇女不能拥有封建权利。虽然当封地变成遗产并且变得可继承时（根据日耳曼人的规则，女性也可以继承），女性的继承（权）被承认；但这并没有改善她们的状况：女人只是一种用以转移统治权的工具，就像希腊那样。

封建财产不像罗马那样是属于家族的，而是属于君主和领主的，女性也属于君王和领主；正是他们决定了她的丈夫。正如所记载的那样，“女继承人就代表着一片土地和一座城堡：追求者们为了这一奖品而争斗，而当她的父亲或领主将她作为奖品赏给任何一位男爵时，这位年轻女士通常只有12岁或更小。”女人需要一位“保护”她和她的权利的领主；因此，勃艮第公爵夫人向国王宣告：“我的丈夫刚刚去世，但哀悼有什么好处？为我找一个有权势的丈夫，因为我非常需要他来保卫我的土地。”在这种形式下，她的配偶对她有很大的婚姻权力，他不经思索就对待她，虐待她，殴打她等等，这里他所需背负的唯一责任是“合乎道理地惩罚她”，与此相同的一些准则今天也被用来规范孩童。

当时盛行的好战观念使得中世纪的骑士更多地关注他的马匹而不是他的妻子，领主们说道：“最该死的就是当一个骑士应该参加比赛时去寻求女人的建议”。女人被命令道：“进入你的寓所，涂抹装点好；坐在树荫下，喝酒，吃饭，编织，给丝绸染色，不要打扰我们的事务。我们的事情是用剑和钢铁战斗。保持安静！”这就是中世纪贵族们如何贬低和抛弃他们的女人。

13世纪，一场“文学女性”运动由南向北传播开来并提高了女性地位；这场运动同那个时代的骑士精神，爱情和强烈的玛丽安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书中有大量关于妇女历史的信息；当然还有有用的数据，除了作者的存在主义概念之外）中所说，它并没有对其（妇女状况）进行深刻的变革，因为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状况的不是观念，而是维持这一状况的经济基础。当采邑权力从基于兵役转变为基于经济时，我们看到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她们完全有能力履行货币义务；这样，征婚权被抑制，对女性的监管权也被废除。

通过这种方式，无论是单身还是丧偶，妇女都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在拥有一个领地时，她统治着它并履行其行政职责，甚至指挥它的防御并参与战斗。但是封建社会，就像所有那些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一样，要求妇女在婚姻中屈服，婚姻权力依然存在：“丈夫是妻子的监护

人”；或者正如波伏娃所说的那样：“一旦婚姻成立，一方和另一方的动产就会因婚姻的道德而变得不分彼此，”这是为婚姻下的监护作辩解。

在封建社会中，正如被剥削者，奴隶制或资本主义统治的其他社会一样，妇女状况总是被描述为受统治和管理的；但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在妇女贫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看到婚姻权利呈现出不同的，相对温和的情形，这种情况的根源必定体现在大众阶层妇女的经济参与且未掌握足够财富的情况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封建主义推向了解体，这种情形在女性的状况上打下了它的烙印。只需强调，在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妇女参加了一般国家代表的选举；这显示了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女性在家庭财权上的存在，因为未经妻子的同意，丈夫不能转让不动产。但是，绝对主义立法很快就会束缚这些规范，以阻止（这些）资产阶级“坏”榜样的扩散。

以上这一历史性的阐述体现了恩格斯关于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及其与财产，家庭和国家关系的经典论点，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其确定性和现实性。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并运用这一立场理解妇女问题，参与解决妇女问题，并且持续地，果断地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论点的歪曲和所谓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所谓的发展只是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思想，使正在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迷失方向。

展示了妇女的社会状况及其与财产，家庭和国家有关的发展历史大纲，剩下的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来分析，机器的发展将妇女和儿童纳入生产过程，从而增加了被剥削者的数量，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家庭，使妇女身体退化，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将她们沉入了（被）剥削的痛苦之中。

分析工作中的妇女和儿童时，卡尔·马克思写道：“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刻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他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取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博学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仍在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资本论》，第一卷，第453-463页。机器和大工业，1966年。原文强调）

继续他的精湛分析，马克思自己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女性的美德和职责为其服务：“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是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糊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

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注释 57，第 463 页。其余同上）

但在资本主义将妇女纳入社会生产来增加剥削的同时，这一过程也为妇女提供了斗争和争取权利的物质基础，这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的起点；因为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讲授的那样：“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我们的重点）。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为未来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将要摧毁他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参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又推动了**妇女的政治化**。我们已经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如何推动妇女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以及它如何通过联合妇女，动员妇女并发动妇女作斗争来为女权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我们还看到了女权主义的要求是如何通过革命活动的兴起而达到和她们取得的成果，在革命进程被束缚和阻断时又是如何被一扫而光的。然而，从把妇女纳入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积极方面来看，与工人阶级将妇女政治化所代表的重大进步相比，由此产生的妇女政治化程度只是基本的，有限的和微小的。这种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当资本主义大规模地将妇女纳入经济过程时，它会将她们从家庭内部拖出，从而吸引她们中的大部分进入工厂受资本主义剥削，从她们中造就产业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女性被锻炼和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先进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通过参与工会斗争开始了她们激进的政治化进程（秘鲁女工，农民和教师在工会斗争中所发生的转变，在我国具体地展现了这种转型所隐含的巨大变化）。妇女参与这种更先进的组织形式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建构和塑造她的无产阶级观念，最后她通过她最优秀的代表们来使她与劳动人民的党的队伍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利用一切形式在一切战线上为人民服务。这种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产生的政治化进程和它所产生的新类型的战斗女性（及其精神）已经在历史上记载的许多光荣的女性斗士中体现出来：路易莎·迈克尔、N. 克鲁普斯卡娅、罗莎·卢森堡、刘胡兰和人民与无产阶级铭记的其他人。

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就像以往一样，妇女的政治化是她们解放斗争中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教导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致库格曼》，1888 年）对于列宁而言，妇女的参与对革命来说更为紧迫和重要：

“所有解放运动的经验证实，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参与的程度。”（我们强调）

因此，在需要于帝国主义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日益尖锐化的过程更加清楚和果断地说明和要求妇女政治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预见未来需要准备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时呼吁争取：“17. 毫无例外地废除相对于男性妇女在政治权力上受到的限制，在战争和稀缺使人民群众感到不安的时候，向群众，特别是在女性中，解释这种转变的特殊紧迫性，唤醒人们特别是妇女对政治的兴趣和关注。”他提出，“我们必须在妇女群众中充分开展系统性的工作。我们必须教育那些我们设法使她们摆脱被动的女性，我们必须吸收她们并武装她们进行斗争，不仅要教育在工厂和家庭劳作的无产阶级妇女，还要教育农民妇女和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妇女政治化，要求她们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强调需要向群众解释政治上吸收妇女的紧迫性，强调需要与她们一起工作、教育她们、组织她们并让她们为一切形式的斗争做好准备；最后，他强调应面向劳动女性；但也不要忘记农民妇

女的重要性，不要忘记各个阶层和阶级受到剥削的妇女，因为所有这些人能而且应该被动员起来进行人民的斗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女性的政治化，认为妇女的斗争是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的倍倍尔说“女人和工人的共同处境是他们都受到压迫”，以及为什么 1879 年的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宣布性别平等以及为此奋斗的必要性并重申革命女权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或者正如中国今天遵循毛泽东的论断而宣称的那样：“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周报》，第 10 期，1972 年）

这使我们考虑**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在调查资本主义社会和那些普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时，恩格斯证实了男人之间存在穷困、不平等和屈从，并强调他指出的女性问题，“男女平等的状况并不比我们从以前的社会条件中继承下来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好多少，这不是对妇女经济压迫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他继续说道：“除非妇女在生产过程中承担着可观的社会意义上的巨大作用而且不再被紧紧束缚于家庭工作中，否则她们不可能得到解放。这种情况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工业不仅大规模接纳女性劳力，而且还要更强烈地需要它。”

恩格斯的这种断言，断章取义来看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那些观点无关……这帮助了一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他们对他的观点进行曲解，宣称妇女仅仅参与经济过程就足以使她们解放。但恩格斯提出，将妇女纳入生产是一个条件，是妇女为自身解放而采取行动的基础，这要求从社会（层面）结束那些使妇女全神贯注的家庭工作，这对恩格斯来说意味着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大规模生产。我们重申，清楚地理解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是必要的，因为今天有人企图拿这一经典（论述）来当挡箭牌，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立场，并为剥削阶级说话，宣扬妇女只需参与经济过程，掩盖（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妇女压迫的根源，并避而不谈以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生产。

与其他情况一样，预见到这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分析了将妇女纳入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程能否真正使男女平等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再次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答案：**“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只能在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实现。”**

列宁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处境，并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这一研究让他得出结论：“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从这一比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工农联盟领导的革命才能真正容许男女之间的法律平等，甚至是强制性地达成这一点。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教导的那样，革命倡导的这种真正的法律平等，只不过是实现了男女生活中完全平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开始：“可是，我们

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伟大的创举》，原文强调）

因此，列宁和毛泽东就这样回击了可以预料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式的修正和所谓的“发展”，这些观点在今天仍试图歪曲恩格斯的论点，混淆工人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视为一场旷日持久但又（必然）胜利的斗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需要彻底改变社会技术和习俗。但这种斗争将以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列宁，《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上》）

实质上，上述内容表明，革命女权主义运动与工人阶级为建设新社会而开展的斗争之间存在同一性；此外，这些也有助于理解列宁呼吁女工充分利用革命赋予她们的制度和手段的发言的意义：“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政治化和妇女状况的核心论点；我们更倾向于引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并不被（人们）充分知晓，而且因为它们已经由作者自己巧妙而简洁地表达出来，这使我们免去了重新编辑它们的任务，完全看到它的现实性之后就更更是如此了。另一方面，今天在妇女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歪曲也要求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文本身的内容。

最后，必不可少的是，要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妇女解放（*emancipation of women*）的思想而非妇女的解放（*women's liberation*）思想，即使只是顺带一提，正如能够从所引用的引文中理解到的那样。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只要通过历史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就足以表明她受到监护和对男性的屈从，这使得女性成为一个人，一个与她的丈夫或与她有关系的男人从属于同一阶级的人，她发现自己处于对相对男性的卑下地位，一种受法律保护、正当化的和强加的卑下地位。与历史上这种被轻视的状况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她们与男性的形式平等，也需要提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建立和落实真正的男女法律平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如列宁所说，生活中的充分平等将随着社会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实现。这些简单的观察表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一部分的妇女解放实现的必然性。虽然关于妇女解放的论点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论点，这些观点掩盖了对妇女压迫的根源，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是男女基于性别的抗衡；今天我们看到妇女解放运动每天都更多地展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其目的是把妇女群众同人民运动分离开，这主要是为了阻挠在工人阶级领导和指引下的妇女运动的发展。

二、马利亚特吉和妇女问题

50年前，马利亚特吉以其敏锐的历史远见，意识到秘鲁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和前瞻性（“第一批女权主义者潜藏在秘鲁……”）；他写下了两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妇女和政治》、《女权主义的要求》，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贡献。我们必须回到马利亚特吉这个源头，

因为我们会在其中找到秘鲁工人阶级对妇女问题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马里亚特吉著作中一个鲜为人知、很少被研究的方面。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教导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不调查和分析社会生活的成因：家庭的组织、妇女的状况，就不能研究社会生活。”在研究新生的秘鲁女权主义运动时，他说：“那些明智看待我们时代的伟大情感的人不能，也不应该觉得自己不适合这种运动。妇女问题是人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让我们注意，秘鲁工人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时就注意到妇女的处境，通过其伟大代表（马利亚特吉）确定了他们对妇女的立场，并为女权主义斗争提供支持，正如 1926 年纺织工人和司机与 *A. Field Co* 的女工的团结一致所显示的那样。

是什么女权主义的发展吸引了如此高度的关注？在这个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秘鲁妇女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变。当农民妇女的状况变化比较缓慢的同时，她们那些成为了工人或职业女性的姐妹则经历了更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显然，在我们社会中，妇女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获得（更高的）地位。

上个世纪，克罗琳达·马托·德·特纳、梅赛德斯·卡贝洛·德·卡博内拉和玛格丽塔·普拉西德斯·门诺兹的行动和文学作品突出了数百万身为农民、工人或其他虽然无名却仍遭受根源于封建制的严酷社会压迫的女性形象。19 世纪的秘鲁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当她被允许接受中等教育时，秘鲁的教育规范将为她设立一个简化的课程标准，这一标准包括与男性的小学最后一年级相当的粗浅课程和一些稍难的中学课程。女性学校教育被放弃通过以下事实被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有私立院校倾向于或准备让女学生进入大学，但直到 1928 年，利马国立妇女学校才在利马建立起来；而在那之前，首都还没有这样的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到上世纪末，一些女性教育工作者担心女性的教育状况，并提出革新（教育制度的）要求：它要求克服错误的“仅仅为了婚姻而教育她们”的观念，这会导致妇女认为婚姻是她们生活唯一的目的。对妇女的教育工作不能交给修女，背弃世界的人不能教育出好妇女，而且我们需要结束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单身或已婚妇女会在社会意义上堕落的错误观念。与此同时她们提出要求并着手建立新的教育中心。特蕾莎·冈萨雷斯·德·法宁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同样地，大学教育的门扉对她们来说是关着的，她们在大学的存在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被注意到，并且直到 1908 年，妇女才被授权进入大学并获得学位或是接受专业训练。因此，在教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妇女的贬低及社会对她们的边缘化。然而，随着 20 世纪带来的转变，妇女看到她们追求学业和作为专业人士工作可能性的增加，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求教师的工作。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能看到女性职业的多元化。本世纪初的女大学毕业生数量可以用手指算出来，而今天女大学毕业生几乎达到全国的 30%。

但真正具有深刻、激进和深远意义的变革是将妇女纳入工厂生产。伴随着机器的引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秘鲁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在本世纪开始了。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环境中，在具体的条件下，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和我们前面所引述的情况下，随着妇女作为工人参与生产，秘鲁的妇女大众参与了无产阶级政治化的进程。妇女开始参加工会，参加争取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她们与其他工人一起参与人民的斗争，反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物价上涨，这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认识；最终，秘鲁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成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装。

秘鲁妇女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其作为劳动力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并行。这在本世纪上半叶帮助秘鲁的阶级斗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这些里程碑中我们必须强调在瓦拉尔、巴兰卡、帕蒂维尔卡和瓦乔的农业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在 1916 年的这场斗争中，五名女工献出

了生命，她们用鲜血展现了她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坚守。正如我们强调的妇女们在 1919 年五月参与的反对物价上涨与抗议高昂生活成本的重要行动中所做的一样，女工们组织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以便引导支持行动并同意“呼吁所有妇女不分阶级地配合她们捍卫秘鲁妇女权利的行动”；在这场伟大的斗争期间，妇女们于 25 日的会议上遭遇警察部队。在战胜了警察的血腥镇压之后，她们宣布了以下结论：

“利马及其周围的城镇和乡村中的妇女在 19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于海王星公园举行的公开会议上见面，并认为：

我们无法进一步容忍高昂的生活用品与住房价格以及人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的减少，这些导致了人民现在所遭受的悲惨状况；秘鲁妇女与所有文明国家的妇女一样，认识到了她们干预并解决影响她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使命；

我们一致同意：

1. 支持在 5 月 4 日在 *Alameda de los Descalzos* 举行的人民会议作出的结论。

2. 如果这些结论不被接受，则宣布一切女性将在所有工业部门进行罢工，罢工结束日期由男性的减少生活费用委员会决定”（引自马丁内斯·德·拉·托雷著，《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秘鲁社会历史》第一卷，利马 1947 年，我们强调。）

妇女斗争史上的另一个篇章是“红色援助”（*Socorro Rojo*）发起的反对桑切斯·塞罗独裁政权迫害、镇压、监禁和血腥政治行为、捍卫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的斗争。

在所提到的斗争中，除了妇女的政治化，或者更严谨地说，这一作为正确观点的标准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妇女群众发起的行动与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她们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她们用行动直接地团结和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她们自己的阶级的斗争。

综合来说，秘鲁妇女在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走过的道路的特点是她们广泛参与受到北美帝国主义推动的官僚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在大学。这些是秘鲁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马利亚特吉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女权主义既不是人为地也不是任意地出现在秘鲁。它的出现是妇女参与新形式的脑力劳动的结果。真正的女权主义妇女是那些工作、学习的妇女。女权主义思想繁荣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妇女：教授、大学生、工人。劳动为女权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大学教室每天都吸引更多的秘鲁妇女；在工会中，招募和组织而来的工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没有诚意、迂腐、庸俗的女权主义。对于这种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主义仅仅是一种文学运动，仅仅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女权主义的要求》，我们强调）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利亚特吉阐述了秘鲁无产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为任何想要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提供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总路线。让我们从这个立场看看我们的基本问题：

1. 妇女状况

从秘鲁无产阶级的角度研究妇女问题，首先要求牢记马利亚特吉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在一个物质条件上落后和受压迫国家的应用，这一应用使他科学地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自 1928 年以来，秘鲁社会发生了一场民族和民主主义革命，它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但这场革命的更高阶段仍然有待完成。这就是马利亚特吉思想的实质和教导；我们必须从这些思想出发，处理他所确立的所有议题和政策，其中包括与妇女问题有关的议题和政策。

因此，马利亚特吉从秘鲁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出发并以此判断妇女的处境。这种方法本身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过时的“女性本性”的理论，而是分析社会结构造成的环境和条件下妇女的活动，并强调妇女状况有动态性和变化性的特征。他指出了劳动造成的妇女社会地位和对妇女看法的转变。以下段落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和其他观点：

*“但是，就算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实现女权主义，它也会不由自主地为其创造实现条件以及物质和道德的前提。资本主义通过更加集中和广泛地利用妇女的工作，将妇女当做生产要素和经济因素衡量。劳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思想和精神。妇女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自己的新定位。在古代，社会注定了妇女去结婚，然后从事闲暇或卑微的工作。今天，最重要的是，社会使她们工作。这一事实已经改变并提升了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因此，秘鲁无产阶级仍然清楚地认识到，是社会，而不是一些恶作剧的天性，造成了妇女所处的环境；妇女的状况是变化的，劳动导致了妇女的地位和对妇女的观念发生巨大飞跃。这是马利亚特吉的出发点，同时它指责生物决定论者将女性简化为简单的再生生产者，并反对狡猾的有助于维持对妇女压迫的玫瑰色神话：“为家庭辩护的诗歌实质上是捍卫对妇女的农奴制，它不会使妇女的角色变得高贵，而会使妇女的地位降低。女性不仅仅是母亲和女人，就像男性不仅仅是男人一样。”（上面两段话引自《女权主义的要求》，我们强调）

在阐述女性状况的社会根源的基础上，马利亚特吉阐述了拉丁妇女和撒克逊妇女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封建社会背景与妇女特质以及她们之间的区别的因果关系：“拉丁女性生活得更谨慎，而激情更少。她没有那种对真理的渴望。西班牙女人尤其谨慎和务实。瓦尔多·弗兰克以令人钦佩的准确性给西班牙女人下了定义：西班牙女人——他写道——在爱情上是实用主义者。她认为爱是为天堂创造孩子的一种手段。欧洲其他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这么一个不世俗、不多情的女人。作为一个女孩，她很漂亮；新的希望为她的脸颊增色，并使她黑色的眼睛更加大而动人。对她而言，婚姻是她可以追求的最高境界。一旦结婚，这种与生俱来的如同春天的风情就像她的一个季节一样消失了：短时间之内，她变得审慎、肥胖和慈爱。”

关于西班牙女人的话自然延伸到拉丁美洲女性，其中包括秘鲁的女性，这表明古代和现代的封建背景所导致的妇女那种精神状态仍未被克服。但除此之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美洲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马利亚特吉强调了美国统治给妇女精神状态带来的深刻的异化：“利马本地的资产阶级与美国资本家，甚至是低级雇员在乡村俱乐部、网球场和街头友好相处。美国人可以结婚，不受到种族或宗教阻碍。混血的女士也可以与其他种族的个人结婚，不受国籍或文化的限制。在这方面，中产阶级女孩没有任何顾忌。能够追上格雷斯公司或基金会雇佣的美国人的女士对她社会地位的提高感到满意。”（《帝国主义者的主张》）

这样就确定了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状况是针对妇女的奴隶制，其基础根植于秘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驳斥了所谓“缺乏妇女本性”给出的一切解释。

在此基础上，马利亚特吉继续对属于不同阶级的秘鲁妇女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他巧妙地描绘了职业妇女：“如果青年群众受到了残酷的剥削，无产阶级妇女就会受到同等或更严重的剥削。直到最近，无产阶级妇女的劳动力都还仅限于国内的家务劳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她们才加入了在工厂、商店、企业等行业的竞争。因此我们在纺织工厂、饼干工厂、洗衣店、容器和纸板箱工厂、肥皂工厂等地看到她们的身影，在那里她们与男性工人做相同的工作，从操作机器到最卑贱枯燥的活她们都做，但她们总是比男性少挣40%到60%。在妇女训练自己从事工业劳动的同时，她们也出现在办公室、商业房屋等地的劳动中。在这些岗位上她们总是与男人竞争，而工业企业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因为工资一旦明显降低，利润就会立即增加。在农业和矿业，我们发现妇女与男性进行了公平坦率的竞争，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发现

大量受剥削的妇女，在各种活动中提供服务……在我们的社会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具体的要求来保护她们。到目前为止，纺织工会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最大的兴趣，虽然并非完全如此，它不止一次地罢工，其目的是强迫拒绝规定的资本家遵守规定，特别是法律规定；我们有一些资本家（比如工人的“朋友”蒂松-布埃诺先生），毫不犹豫地将一名女工怀孕的事实视为“罪行”，并通过惩罚她的这一“罪行”来避免遵守法律规定的內容。在饼干工厂对妇女进行的剥削是卑鄙的。”（《秘鲁工人总联合会[CGTP]告秘鲁工人阶级宣言》，妇女问题；这是一份在马里亚特吉领导下编写的文件。）

这是一个有效的描述吗？是；在本质上，男女工人的情况仍然是一样的：最广泛的剥削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中，其中一些部门的剥削确实是骇人的：使用女性劳动力以降低工资，是以她们的低于支付给男性的工资、没有得到履行的保护妇女的法律，以及被无产阶级的虚伪“朋友”隐藏起来的反工人的立场为基础的。捍卫女工取得的成就在今天也是急需的。

同样地，马里亚特吉继续审查当地农民妇女的状况。他说，妇女与她们的孩子一起，有义务“向业主及其家属和当局提供无偿服务”；她们的悲惨状况和社会地位有其根源：土地垄断和农奴制。

关于小资产阶级，除了指出这一阶级的妇女所受苦难之外，对小学教师的分析帮助马里亚特吉确定了她们的社会意义，即她们与人民的接近以及她们对全职教学的奉献精神如何改变她们的态度，在她们的灵魂中可以看到“建立新社会国家的理想”。这是因为“她们的利益与小资产阶级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的生活、贫困、工作使她与无产阶级群众结合。”他建议与小资产阶级妇女沟通，因为“在她们的队伍中，先锋队将招募到更多更好的成员。”

2. 女权主义斗争的历史背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里亚特吉认为，工业化使妇女参与工作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她的状况和认识。他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样，指出了双重处境：“当妇女在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时，如果这条道路处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她们就会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成为男性工人的重要竞争对手。”（出处同上）另一方面，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包括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些元素，他澄清了对平等派领袖巴布夫形象的质疑，认为其是一个“主张女权主义的人”，并且引用了巴贝夫以下清晰的词句“不要迫使这个不应该被蔑视的性别沉默……如果你不指望女性在你的共和国做任何事情，你就会让她们爱上君主制”和“男性暴政一直想废除的性别（女性），在革命中从来都不是无用的。”

在《妇女和政治》中，他衡量了法国大革命对解放妇女的贡献：

“然而，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男性享有政治平等，而女性被排斥在外的制度。人权可以被称为男子权力。相比于贵族统治，妇女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更加远离政治。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男性的民主，但它的发展最终必然会有利于妇女解放。资本主义文明为妇女提供了提高其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地位的手段。”

因此，可以准确地确定资产阶级对妇女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能够为她们的发展提供条件，但却无法使她们获得解放。马里亚特吉非常了解这一点：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为妇女提供了进入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大门，这一点在20世纪尤其明显，以至于20世纪已成为了这一点的象征。在陈述观点的过程中，马里亚特吉本人为许多著名的女性辩护，指出和展示了许多女性对诗歌、小说、艺术以及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贡献。

通过指出她们的优点和缺点、帮助我们认识到每个个例中什么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突出她们对妇女进步的贡献，他告诉我们如何评判来自各个阶级的著名妇女。

3. 女权主义运动

今天，一个重中之重的中心点是马利亚特吉关于女权主义的命题和对妇女一般问题的方案，其中三个部分值得注意：女权主义、妇女的政治化和妇女的组织。

关于**女权主义**。马利亚特吉认为它“既不是人为地也不是随机地”出现在我们中间，它的出现与妇女开始融入体力和脑力劳动相对应；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强调女权主义主要在那些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妇女中茁壮成长，并指出大学课堂和工会是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合适环境。然后，他做出了指导我们前进方向的指示以推动妇女的动员。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方向绝不意味着轻视农民妇女；因为我们必须记住，马利亚特吉认为农民妇女是我们革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阶级，农民妇女无疑也是动员的前线，更是整个女权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想要掌握的主要资源。

在《女权主义的要求》中，马利亚特吉指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质：“我们不应该对不是所有女性都聚集在一个单一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感到惊讶。女权主义必然有多种色彩，各种倾向。应该区别对待在女权主义中的三种基本倾向、三种实质性的颜色：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这些女权主义中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资产阶级女性将女权主义与保守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女性将她的女权主义与革命群众对未来社会的信仰统一起来。阶级斗争——它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主张——反映在女权主义舞台上。女人，就像男人一样，也分为反动派、中间派或革命者。因此，（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她们不可能在一场战斗中并肩作战。在当前的人类全景中，阶级比性别更能区分个体。”

这就是我们的妇女问题的本质——整个女权运动的阶级性。今天，我们必须更加牢记这一点，因为妇女的组织化进程又一次向前推进了。许多妇女组织兴起了，它们一般是不谈或隐蔽它们的阶级属性，即它们所服务的阶级，并宣扬妇女联合起来反对男子来要求她们的权利。它们好像是不分阶级地为所有团结起来的妇女服务，经由一些模糊或混淆的过渡式的阶级立场来争取所谓的“人道主义、基督教和团结”的社会转型。实质的问题在于确定每个女性团体、机构、阵线或运动的阶级根源以区别它们的立场，确定它们所服务的是谁、所服务的是哪个阶级，以及它们是否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疑问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根据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阶级标准和方向，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女权运动？马利亚特吉的立场是精彩而简洁的：“女权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想法，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而对他而言，革命本质上意味着无产阶级；这样一来，真正想要为人民和革命服务的整个**人民妇女运动**，必须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女权运动。今天在我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意味着坚持马利亚特吉的思想。

关于**妇女的政治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动员妇女并发展她们的组织。没有动员和组织，我们就无法与她们并肩作战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的伟大榜样之后，秘鲁工人阶级，如马利亚特吉，已经指出了妇女政治化的重要性，并强调妇女政治化的缺失有利于反动派。

“由于绝大多数妇女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她们绝大多数时候在当代斗争中不是一种革命力量，而是一种反动力量。”（《世界生活的数字和方面》）

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必须问的是：妇女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对于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言，它意味着妇女坚定而激进地融入阶级斗争，将妇女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让她们融入组织学习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切都要在无产阶级的评估和领导之下。综合来说，就是让妇女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参与政治，参与阶级斗争。

关于**妇女的组织**。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才能面对敌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那些只有在有组织的情况下才会有实力的人，因此也适用于妇女，她们只有在组织起来时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作为“被定罪和供认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利亚特吉创造性地应用了这些原理。他特别注意组织女工，正如上文提到的《秘鲁工人总联合会宣言》中所指出的：

“受剥削妇女积累的‘灾难’只有通过直接组织起来才能解决。就像必须培养青年干部一样，工会必须建立它们的妇女部门，在那里教育我们未来的妇女斗士。”

在马利亚特吉的指导下，秘鲁工人总联合会的章程准备在执行委员会一级成立常设妇女委员会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不幸的是，人们没有正确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方针。当它完全退出时，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被称为“女性事务”或类似的名称的官僚主义工会，而没有有机地容纳工会的妇女部门，因此，这仍然是一项悬而未决的任务。

后来，在1930年3月，共产党批准了以下提案：

“第一，建立一个临时秘书处，在党的直接控制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第二，建立一个临时秘书处，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职业妇女。

第三，以上两个秘书处应当争取立即把男女青年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他们加入共产党的准备阶段。”（马丁内斯·德·拉·托雷著，同前，第二卷；我们强调。）

在这里，马利亚特吉的论点表现为需要关注妇女的组织，即使是在最先进的政治层面；他的立场是妇女组织化，说到底是在工人阶级及党的领导和控制下组织起来的问题。这些建议引导我们扪心自问，在每个妇女组织、机构阵线或运动中，妇女是为了哪个阶级组织的？她们是如何组织的？她们为了什么才组织起来的？请记住，为了阶级和广大人民，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

马利亚特吉提出的三个问题（女权主义、妇女的政治化以及妇女组织）以及他所确立的理论都必须不断地加以研究和应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而且普遍的女权主义运动。



4. 妇女解放

在这一点上，马利亚特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条件下，“妇女在解放的道路上前进了”。然而，在这种制度下，妇女甚至连法律名义上的男女平等都没有实现。因此，如果一个持续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要走得更远，在这条道路上运动必然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理解使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说道：“女权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女权主义生于自由主义，但只有革命才能实现女权主义的要求：

“自由主义孕育了女权主义，但女权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实现。只有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道路到达终点时，女性才能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俄国革命明确地赋予了妇女平等和自由，而这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巴贝夫和法国大革命中其他平等主义者一直在徒劳地呼吁实现的。”（《女权主义的要求》）

因此，在新社会建设的同时，新女性将会“与现在衰落的文明所形成的女性大不相同”。这些新的女性将在革命熔炉中锻炼自己，并将受因新女性尊严的觉醒而逐渐沉没的旧剥削制度摧残的旧式妇女置于历史的幕后。

“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个人主义制度的同时，现在女性所追求的奢侈和优雅将衰落……人类将失去一些奢侈的哺乳动物，但将得到许多新的妇女。未来妇女的服装将不那么华美和昂贵。但这个新女性的状况将是有尊严的；而女性生活的轴心将从个人发展到社会……一个女人总的来说将更不奢华，但可以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妇女与政治》）

除了这些基本想法外，马利亚特吉还处理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离婚、婚姻、爱情等；他用讽刺的方式对待它们，并对它们采取尖锐的批评立场。然而，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它们身上，直到它们成为主要矛盾。不这么做就是忘记主要的斗争和根本目标，同时也会传播混乱和误导革命斗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出并阐述了马利亚特吉关于妇女问题思想的中心论点，其中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引文，原因与我们处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主题的立场时的原因相同。